

· 简讯 ·

商务部否认利用“双反”回击美国贸易调查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2月8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在回应是否利用对美国高粱发起“双反”调查回击贸易纠纷一事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近几年美国对中国高粱出口数量激增,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生产状况、财务状况受到损害,因而商务部决定发起贸易调查,这是一起正常的贸易救济案件。中国一贯反对贸易救济措施的随意性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做法,也会严格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相关法律,开展贸易救济实践。

近段时间,美国调查机关频频对中国产的橡皮圈以及燃油泵、总成组件等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引发业界担忧。高峰进一步指出,贸易救济应该是国际贸易中,对本国产业最后的保护屏障,而不应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方希望与美方共同努力,妥善管控经贸领域的分歧,做大合作面,缩小分歧面,使双边经贸摩擦不要成为惊涛骇浪,影响中美合作大船的平稳航行。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自2013年起,中国自美进口高粱占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从2013年的8%上升到2016年的61%。与此同时,自美国进口高粱的价格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受此冲击,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生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受到了损害。

今年北京将利用地下人防空间建1万个停车位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2月8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提出的2018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报告并做出决议。北京市副市长王红在做报告说明时介绍,今年北京将推进31项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其中包括充分利用地下人防空间,提供1万个停车位、500处公益便民和社会服务场地。分析认为,对于当前停车资源相对紧张的北京而言,人防空间车位将成为有效补充。

据了解,去年11月,经市人大会常委会三审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就提出,为挖掘停车资源,利用地下空间单独选址的,可以依法办理规划和土地手续,利用人防工程的,可以减免工程使用费。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北京将开展地下空间分层出让建设公共停车场试点。此前公布的北京市停车资源普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市城镇地区最终核定车位总数为382万个,停车位缺口达129万个,主要分布在居住区。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副主任吴洪洋分析称,现阶段,北京可供建设公共停车设施的地下空间资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既有存量非公共停车设施向社会“共享”,另一类则是在医院、学校、车站等人流相对密集的地区新建相关设施。

贸易顺差收窄近60% 1月我国进出口延续向好态势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2月8日,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延续了去年以来的两位数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6%、进口增长30.2%,贸易顺差1358亿元,收窄59.7%。业内人士认为,进出口增速呈现巨大反差,一方面印证我国兑现扩大进口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国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具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且比重提升,1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47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8.6%,比去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为27.2%。而在主要贸易伙伴方面,1月中欧贸易总值同比增长17.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5.1%,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人民币汇率因素是促成“出口难受、进口舒服”的一个原因,另外,今年春节在2月,进口企业1月提前备货的情况也比较常见。总体上看,贸易顺差收窄符合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地位”,白明表示,我国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承诺扩大进口,让更多国家和地区有机会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

北京城乡低保家庭人均提高100元/月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王寅浩)2月8日,北京市民政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调研员张贵国介绍,今年起,北京城乡低保标准从家庭月人均900元调整到1000元,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从家庭月人均1410元调整为2000元,并于春节前按新标准完成发放。

据张贵国介绍,北京在2005年、2006年分别建立了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低保标准每年调整一次,从2013-2018年,北京城市低保标准由家庭月人均580元调整至1000元,年均增幅约12.1%;农村低保最低标准从家庭月人均460元提高到1000元,年均增幅约19.6%。2015年7月,北京率先在全国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并轨。截至去年12月底,北京城乡低保共有7.27万户、12.05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7.68万人,农村低保对象4.37万人。

此外,2009年,北京建立了城乡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对于家庭收入高于城乡低保标准,低于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的低收入家庭,可根据家庭困难情况申请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待遇,扩大了救助范围。

责编 林海英 美编 张彬 责校 王坤 电话:64101946 bbtzbs@163.com

出口承压 人民币急升势头暂缓

开年以来气势如虹的人民币上升势头有所暂缓,2月8日,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双双下行。业内人士分析称,其实此前随着人民币的急涨,已经令一些出口企业承压,2月8日公布的最新进出口数据再次印证了这种压力的存在,加上此前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新的预算法案,美元受到一定提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令人民币出现下跌,但也不必过度解读和紧张,中长期人民币升值趋势并没有变化。

快速升值势头暂缓

2月8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较前一个交易日上调60点,报6.2822元。但日内人民币汇率走势却没有顺着“风向标”上行,而是一路下行。

据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2月8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收盘价报6.3260,较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大跌664点,创2015年8月12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如果从实时数据来看,截至18时30分,在岸人民币日内最低触及6.34,单日跌幅超过75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日内最低跌至6.3775,日内跌幅超过820个基点。

不得不提的是,早前一轮快速升值的幅度同样颇引人注目。数据显示,1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3.5%,创1994年汇改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与人民币相对的是汇率“跷跷板”另一头美元的变化。进入2018年后,美元指数比2017年更为糟糕,1月下跌超过2.4%,并在1月24日跌破90关口,是时隔三年多来首次跌破90。不过,近日

2018年2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每日收盘价



美元也强势反弹,2月7日重新回到90以上,截至2月8日18时30分,美元指数报90.4390。

贸易数据发布为一大诱因

对于2月8日人民币和美元的表现,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当日的汇率波动,主要是前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新的预算法案,使美国预算问题短期内看到曙光,美元获得提振,人民币兑美元则出现贬值走势。

还有一个诱因则是同日公布的1月进出口数据。据海关统计,今年1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2%。其中,出口1.32万亿元,增长6%;进口1.19万亿元,增长30.2%;贸易顺差1358亿元,收窄59.7%。

“出口增速较前两个月有所放缓,大家也是担心前期人民币过快升值是否会影响到出口。在消息面和数据公布后,对市场情绪有影响。”温彬说道。

稀财汇创始人、500金研究院院长肖磊也指出,市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引发政策层面对贸易顺差的警惕,加上近日美元指数的走强,也直接拉低人民币汇率,市场预期迅速改变,短期看人民币汇率有进一步回调的预期。

事实上,在2017年人民币逐渐回归上升通道后,期间几度急速升值就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央行在2017年9月和2018年1月上旬,分别以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暂停逆周期因子的操作为人民币过热的升值势头降温。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也都指出,要警惕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过度膨胀,其中一个影响就是进出口。事实也印证,201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整体波动中的大幅升值令市场颇为意外,不少筹算着从汇率波

动中获利的出口外贸企业猝不及防,营收或因汇兑而遭遇损失。

中长期升值趋势不变

不过,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中长期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会改变。温彬认为,2月8日人民币暴跌更多还是交易层面,但总的的趋势没有变。人民币兑美元在一个合理均衡的水平上是双向波动,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对供求关系产生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弹性也是在增加的,因此对波动不必过度解读和关注,这是市场交易导致的双向波动”。

“双向波动”这一表现也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提及,他表示,作为正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人民币,出现升值与下调的动态调整,仍然是正常现象,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双向波动”。

赵锡军进一步分析称,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越来越由市场的因素来决定,市场因素则包括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长期就是中国的经济走势、美国经济走势等,短期就是受政策和市场预期两个方面影响。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元的政策应该说处于缩表和加息这样一个通道,人民币是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两者的政策都是趋紧的,但是具体要看预期,哪一种货币的政策趋紧的节奏更快,一年中它会随时发生逆转和变化,而“双向波动”的局面还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北京商报记者 程维妙
实习记者 宋亦桐/文 张彬/制表

T 今日评 Today's review

央地财权事权划分是“硬骨头”

韩哲

长期以来模糊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终于向前迈出了第一步,也是容易的一步。

2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将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基本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卫生计生、基本生活救助、基本住房保障等八大类18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首先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具体比例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我国财税体制的结构和现状,总的来说就是央地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拿着大致55%的收入,但承担着85%的财政总支出,差额部分则由中央转移支付。这导致很多基本公共服务所形成的事权不加区别,以上级决定、下级执行、经费分级分比例承担的模式运行,但在具体使用方面存在很大弹性,也不可避

免地滋生“跑部钱进”和“跑冒滴漏”等问题。

央地共同事权的划分,仍然只是在原有分税制框架里的技术性调整。而央地财权事权划分的要害在于,究竟财权要不要下放,以及事权要不要上移。简单说,要不要分权。现在看来,改革更倾向于集权而非分权。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此前表示,事权划分改革的要义在于通过实体化方式,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按照事权属性,涉及国家主权、经济总量平衡和区域协调发展、全要素流动等领域的事权,必须要完整集中到中央,确保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划分财政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上下级财力余缺,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是确保政府间财政体制有效运转的理性选择。

20多年的分税制,最大的问题是分了钱,没分权。这导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重复交叉,效率不高。财权和事权如何匹配,分税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摆脱“分钱制”的质疑。分税制的另一个问题是,省级以下的分税制几乎无解。中国的“地方”概念包括省市县乡四个层级,加上中央,整个政府财力分配体系中至少共有五个层级,在20个左右的税种中实行五级“分税”,不啻于在5个鸡蛋上跳舞。因而省以下迟迟未能迈进分税制的大门。

事实上,改革千头万绪,对于决策者而言重在抓住制度激励,放权让利是激励,承包是激励,产权也是激励,所有这些都要形成一种制度安排。没有激励,穷亦不思变。承包激励了农民,产权激励了企业,分税制在初期激励了地方政府。因此,如何划分央地的财权和事权,确实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最大“硬骨头”,需要有大智慧、大定力。

(上接1版)

公共服务支出划定央地 责任清单”

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看来,此次明确的18项基本公共服务,都是以往地方财政的主要支出项,原本中央财政就负担有一部分支出责任。“但是此前各项制度并未将中央财政的这一支出责任明确下来,也就是说,中央财政今年给某地方某项目拨款,但不一定明年也一样,在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公共住房保障这些领域,一旦中央财政‘断顿’,将给地方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冯俏彬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方案》在制度层面划定了中央、地方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同时明确了具体支出比例,是攻坚已久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迈出的一大步,有利于地方财政明确预期、统筹财力,更好地协调本地经济社会发展。

“以《方案》中提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为例,在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支出上,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一直是比较模糊。”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直言,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和缴费形成的基金没有关系,所有发放养老金等支出都来源于各级财政补贴,而且央地分担比例也因地区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来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齐登钧介绍,我国对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管理,主要是沿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办

法,由于总体支出压力相对较小等原因,所以一直是“财政来负担发放”。中央补贴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各地的财政收入情况确定,基本上遵循东部地方财政出资,中西部中央主要负担的原则。”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此次《方案》主要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相关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但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中虽有提及推动省以下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但没有详细阐述,这也是从易到难的战略考虑。

财政的“首项改革”

“事权划分改革应该排在财政改革首位”,这是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去年底从一个老财政人的角度所阐述的观点。而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也曾明确表示,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实际上,2016年,国务院就曾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这项改革的推进计划,其中提出:2017-2018年争取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领域改革,梳理需要上升为法律法规的内容,适时制定修订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研究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包干制,再到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变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渐明确,而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体系框架。

“但受当时以及实施过程中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在沿袭已有做法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一些局部调整。在新的形势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与推进财税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比,越来越不适应。”上述财政部负责人表示,这种不适应具体表现在: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场调节或社会提供的事务,财政包揽过多,同时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承担不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承担,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不少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交叉重叠,共同承担的事项较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规范。业内表示,随着《方案》的落地,越来越多的责任划分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财政收入的利用将循着更加法治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行。